

一位数学教授的历史发现

——对话填补南京大屠杀研究空白的调查者费仲兴

步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历史调查,对从事数学研究的南京炮兵学院教授费仲兴来说,更多是“误打误撞”,但正是他的研究调查,填补了南京大屠杀研究的一块空白。

7月16日,齐鲁晚报专访了费仲兴。在他看来,如今对重大事件的记录还不够完整,多是宏观记录,缺少微观的视角。而通过多年的调查,费仲兴也正在经历一场自我教育。

►2007年3月23日,费仲兴对日本青年访问团讲述西岗头屠杀惨案。(资料片)



本报深度记者 刘德峰

这样的调查需要就近、就地

齐鲁晚报: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历史调查过程中,您具体调查了哪些幸存者?

费仲兴:我集中调查的是汤山地区的幸存者群体,走访的幸存者所在地范围包括以前的汤山镇、山峰镇和麒麟镇的农村地区。

齐鲁晚报: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调查的?

费仲兴:从2001年就开始了,那时候我还得上课,所以只能做一些零散的调查。2004年退休以后,我开始集中精力做这方面的调查,一做就是4年多的时间。

齐鲁晚报:为什么选择汤山这个地方?

费仲兴:因为炮兵学院在汤山,我也长住在那里,到附近的农村调查比较方便。后来我才知道,在我之前,南京市的一些研究者和少数日本友好团体,也曾深入这个地区做过调查。

我老家是无锡的,和汤山毗邻,语言、风俗习惯上都极为相近,所以我和当地人交流起来没有障碍。我感觉像这样的调查,就需要就近、就地,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,而且在语言交流上没有困难。

齐鲁晚报:您调查的幸存者在年龄分布上有什么特点?

费仲兴:基本上都是当年才10岁左右的人,他们都经历

过1937年冬到1938年春的“跑反”。

齐鲁晚报:在您调查的幸存者里面,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?

费仲兴:一个是孟家场的潘巧英。她的爷爷、父亲和表哥被日军残忍杀害。另一个是作厂村的高树录,他家里还保存着很多“跑反”期间的老物件。

齐鲁晚报:“跑反”?

费仲兴:对,这个很特别。这个词是当地人对大屠杀期间到处躲藏的那种状态的称谓。你如果问他们“南京大屠杀”的事情,他们都不懂,但只要你说起“跑反”,他们马上就知道了是怎么回事了,也能很快回忆起自己在山里面、寺庙里面、芦苇荡里面到处躲藏的经历。



费仲兴参与编写的《南京大屠杀史料集》。

日军在南京农村地区的屠杀持续更长

齐鲁晚报:通过这些年的调查,您有哪些发现?

费仲兴:我一共走访了350位幸存者,确定了834位大屠杀遇难者,也基本上摸清了整个地区面上的情况。根据我的估算,在汤山沦陷8年期间,遇难者人数应该在1000人至1500人之间。

实际上,侵华日军第16师团从从容容向南京进攻时,一路上烧杀奸淫、无恶不作,一点也不亚于他们日后在南京城内的所作所为。与南京城区相比,侵华日军在南京农村地区的屠杀,开始时间要早一些,持续的时间也要更长一些。

齐鲁晚报:在调查的过程中,对您个人而言,又有哪些收获?

费仲兴:这些年的调查,对我来说也是一次自我教育。汤山地区的情况,我以前了解得很少。此前我一直认为,南京大屠杀是日军在南京城内及城区的长江南岸进行的血腥屠杀。通过调查我发现,这种认识并不完整。南京大屠杀应该是日军进攻南京城后,在城内对外对军人、老百姓的血腥屠杀。

齐鲁晚报:在采集这些口述材料的时候,有没有遇到困难?

费仲兴:因为在我开始调查的时候,很多幸存者年纪都已经很大了,所以他们口述的内容比较碎片化,而且在回忆的时候,思维也常常比较跳跃。好在同村的不同幸存者所讲述的内容会

有交叉,可以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证据链条。一般来讲,一个村里5到6位老人讲述的内容,基本上就可以把整个村的情况反映出来。

在走访的过程中我也慢慢摸索,经过一段时间的走访以后,我每到一个村,就会先到村民中间打听,村里有哪些80岁以上的老人,身体怎么样,听力好不好,健谈不健谈等等,心里有数以后再到老人家里去,这样采集到的口述材料会比较完整,也更详细。

齐鲁晚报:在您看来,幸存者所在的家庭,在历史记忆的传承方面做得怎么样?

费仲兴:南京大屠杀的经历对这些老人而言,都是刻骨铭心的,是不会忘记的。他们也时常对孩子们讲那些年的故事。

齐鲁晚报:那据您观察,这种传承对后代的历史认知又有哪些影响?

费仲兴:老百姓不是外交家,对侵华日军痛恨的情绪还是要多一些。哪怕在未来的某一天,仍然必须要直面这种情绪,跨过这道坎。

我们对重大事件记录还不够完整

齐鲁晚报:经过这么长时间,现在您对口述历史这样的工作怎么看?

费仲兴:我感觉在某些方面,我国对重大事件的记录还不够完整,而且多是宏观视角下的记录。而我采集的这些资料,都是幸存者的亲身经历,是完全微观的。如果把这些资料和宏观的

历史资料结合起来,传播或者教育的效果就更好了。

另外,我认为要做好这项工作,调查者需要具备几个条件:首先是身体条件要好,要有充足的体力和精力去调查;其次是经济条件不能太差,毕竟调查时需要有花费和开销的;再一点,是调查者的文化程度不能太低,对历史知识比较了解;最后,调查者得有毅力,能下工夫。

齐鲁晚报:最近您还去过汤山吗?

费仲兴:自从搬到南京市区住以后,我就很少再过去了。但每年都会有一些民间团体到汤山去调研,找到我的时候我就带他们过去,给他们介绍幸存者,让他们再去调查。

齐鲁晚报:您了解日本国内对南京大屠杀的态度吗?

费仲兴:2011年12月,一个日本民间团体邀请我到日本参加证言集会。他们带我们去了东京、大阪、名古屋等8个城市,每到一个城市就举行室内的集会并让我发言。

曾经在一个城市,我记不起是哪一个是,集会的时候有日本的右翼分子——我估计也不是真正的右翼分子,是他们雇来的——就在会场外面用高音喇叭喊话。因为这个团体申请了当地警方的保护,所以他们也不进来。我就问翻译,他们喊的是什么。翻译说,他们在喊皇军是莫大的好。这个民间团体的一位成员接着对我说,不用理会他们。

本报深度记者刘德峰邮箱: ludefeng444@126.com

抢救幸存者记忆

上接B01版

难以触碰的伤痛

即便出发点是历史,真相和传承,可每一次口述调查难免会触碰到幸存者心中的伤痛。

“我的母亲已经去世3年多了,她的故事我也不想再提了。”7月12日,当齐鲁晚报记者拨通一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家属的电话,对方听完记者的来意后,礼貌地拒绝了采访。

7月11日上午和下午,齐鲁晚报记者两次来到栖霞区的一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家中走访,可敲门时始终无人应答。11日傍晚时分,与该幸存者住在

同一单元的邻居告诉记者,老人应该是出门锻炼了,并建议记者晚点再来。

而当小区居民陆续结束锻炼回家休息时,记者试图再次登门拜访,仍无人回应。情急之下,记者留下名片,以期能与幸存者及其家属建立联系,并表明了第二天再来拜访的意愿。

7月12日上午,齐鲁晚报记者第三次来到该幸存者家门口时发现,名片已被收起,而敲门仍无回应。

这或许能代表一部分幸存者的情绪。

费仲兴在调查中也发现,南京大屠杀的惨痛经历,或多或少地在幸存者心中留下阴影。“有位曾被

日军强征为慰安妇的老人,现在提起侵华日军来还会害怕。”

费仲兴说,更有老人直到现在都不敢看电视剧中侵华日军行凶的画面。

此外,费仲兴还在调查中发现,对于父母的苦难,能写成文字材料的实属罕见。“1964年前后,我国曾进行过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,让老百姓忆苦思甜。”

费仲兴说,虽然基本上每个生产队都组织过,不少幸存者也讲述过自己在南京大屠杀中的经历,但形成文字材料的基本找不到。

“如果能形成记录,数量应该非常多,这就是最重要的原始资料,是对此前宏观视角下的历史

教育最好的注脚。”费仲兴说。

作为一个民间记录者,费仲兴深知调查的不易。“交通是否便利,幸存者的身体条件和精神条件如何,调查者是否熟悉幸存者所在地的语言及生活习惯都是问题。”他把自己在调查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,数得非常细致。

在费仲兴深入汤山农村地区调查之前,南京市的研究者和少数日本友好团体也曾在这地区做过调查。“因为交通不方便,语言交流上的种种问题,这些调查并没能取得太大的成果。”费仲兴说,还有媒体在看到他的研究成果后,接着赶赴汤山采访,但他仔细看完节目后发现,一些细节上出现了错误。

“还要有毅力,能下工夫。”费仲兴说,在长年的调查生活中,采访、记录、整理汇总及电子文档录入,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他一个人完成。“曾经有学生觉得我做的工作很有意思,就跟我到农村去调查,结果去了一两次就放弃了。”除部分学生因为“听不懂”老人讲话而放弃外,也有部分学生无法忍受奔波之苦和记录工作的繁琐。

对于新开启的遗嘱登记工作,他持乐观谨慎的态度。“可以肯定的是,有总比没有强,但他们也可能遇到这些问题,希望我的经历能给他们提供一些借鉴。”

本报深度记者刘德峰邮箱: ludefeng444@126.com